

日本樱花象征意义的考察

舒方鸿*

内容提要：在日本，樱花除了植物属性的“能指”，还具有抽象的、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个庞大、变化的具有多重复杂内涵的体系。它走过了一条从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赏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被推至“国花”高位的历程。作为文化符号的樱花，其象征意义不断变迁。近代以后，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演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改变。本文揭示樱花被塑造造成国花的历史基础以及战争中关于樱花的种种“言说”，从而解析近代以来日本樱花所隐喻的主要元素。

关键词：樱花 象征意义 帝国 隐喻

一 樱花的“能指”与“所指”

在日本，如果单说一个“花”字，一般就指樱花。¹ 虽然未经法定，但按惯习日本人早已视其为“国花”。如此，即有花=樱花=国花这一等式的成立。国花，顾名思义乃代表一国之花，如同国旗、国徽、国歌，不仅仅是具象的物，还同现代民族、国家等概念联结在一起。樱花其实已从植物属性的“能指”剥离开来，抽象为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一种文化符号。

考察樱花这一日本特殊的文化符号的内涵，可以从历史文化论——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美学、文学叙事、政治学等多种维度分析把握。樱花在日本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相异的意义所指，且即便在同一时间轴上，由于视角不同也会有不一样的解读。日本樱花这一符号显然不是单数的某事某物的表象，而是一个庞大的、变化的、具有多重复杂内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学院讲师。

¹ 参见《广辞苑》等日本辞书关于“花”这一词条解释。譬如《广辞苑》（第五版）词条“花”的释义¹：“特指梅花或樱花，平安后期以后指樱花。”

涵的体系。因此，对樱花文化的解析也为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一条路径，同时成为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个课题。

如前所述，国花因其与国家、民族的概念相连，故应是一个近代性的范畴。关于国花的起源虽不明确，但一般认为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英国人从王室的图案、勋章、货币等作为标志使用的花，以及文学、传说里广为流布的花中选出“national flower”（国花），“国花”称谓或由此而来。

而在日本，樱花自古为人们所喜爱，后随着近代国家的建立，樱花自然扮演了“国花”的角色。明治时期，樱花就屡次作为日本与他国交往时显示亲善的道具，最初的事例是于 1909 年、1912 年两度赠樱花树予美国首都华盛顿。以降，赠樱花树遂成日本外交手段之一。譬如，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田中角荣首相以日本国民名义向中国赠送樱花树，后分植于北京、天津、沈阳。¹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两德统一时，日本曾发起募捐在柏林墙废墟植樱花树活动，结果用捐款购得 7000 株树苗赠给柏林与波茨坦。由此，樱花似乎代表着日本国家、人民，成为友好、和平的象征。

然而，纵观近代的日本，从明治到二战结束的 1945 年为止的这段时期，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演进，樱花的象征意义不断改变，其并非只限于某种单一的意味，而具有多重的内涵。作为国花的符号系统，它容纳了复数的意识形态指向，并始终为人所操弄。樱花上升为国花的过程，正是樱花这一文化符号内涵被政治符号内涵置换、其隐喻被逐渐建构的过程。检视被历史经纬所缠绕的、繁芜的关于樱花的“言说”，目的在于发现、解构这一过程，从而揭示出樱花的种种象征意义及隐喻所指，更重要的是置换樱花符号内涵的助推力也将清晰可现，为认识近代日本提供一个观照的视角，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¹ 参见李雷等：《国花·国树·国鸟·国兽——千姿百态的国家象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8 页。

二 “国花”前史：樱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以来，樱花被上升到日本国花的高度，成为明治、大正及昭和前半期日本帝国种种意识形态的表象，成为复数的帝国隐喻的集约，它也是历史的产物，一个在“日本”这个特殊语境下各种力量推动下的“自然化”过程。近代以前，已经为樱花作为国花登台准备了可能的舞台。

首先，日本传统文化中樱花已被塑造成跟神话、土俗信仰甚至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的符号。樱花的登场最早见于日本8世纪初所编撰的《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等历史典籍的神话传说中。《古事记》里记载的天孙（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的妻子、神武天皇曾祖母——木花之佐久夜毘卖（《日本书纪》中为“木花之开耶姬”），其名“木花”在古代日本专指樱花。而且，根据著名语言学家山田孝雄考证，古日语存在 ra 音转为 ya 的运用情况，故“佐久夜”（sakuya）其实就是“樱花”（sakura）。^① 换句话说，木花之佐久夜毘卖即“樱花女神”。

与此神话故事相关联，日本有一始自原始时代的“浅间信仰”，即把富士山奉为神山的一种自然崇拜。在日本关东、中部地区，建有不少浅间神社，其中供奉的主神就是木花之佐久夜毘卖。木花之佐久夜毘卖与神山富士山结合，并成为其神体，成为世人祈求平安与守护的神祇。而且，正是木花之佐久夜毘卖被视做樱花的“神灵”，樱花树自古以来被看作神木。

除了上述神话，还有认为樱花与谷物之神灵相关联的说法。有学者指出，樱花（sakura）中的 sa 为谷物之神，kura 为神之坐台，因而樱花就是田神（谷物神）依附之所的意思，樱花盛开即为田神到访的象征。从弥生时代已经成为农耕民族的日本人社会中，樱花被当做田神之花。^② 此外，日本民俗学者和歌森太郎也认为，sa 是稻田的神灵。从诸

① 山田孝雄『桜史』、講談社、1993年、21頁。

② 西山松之助『花と日本文化』、吉川弘文館、1985年、37頁。

如磐座 (iwa kura)、高御座 (takami kura) 等例子看 (日文里“座”读做 kura), kura 在古语中应该是神灵的供台。对于农民乃至对于整个古代的日本人来说, 樱花也许原本就是稻谷神灵的依归之物。^① 也就是说, 和歌森氏认为稻谷神——sa 神即田神信仰存在, 且这种信仰的神祇就栖宿于樱花之树。不过, 被称做日本民俗学开创者的柳田国男通过对垂樱 (樱花一种, 又称“丝樱”) 的考察, 发现垂樱多植于墓地灵界以及神社佛阁处, 认为樱花与死灵信仰有关, 推断是因为人们相信行空神灵地上降临之时, 乃择樱树而栖; 还根据观樱花祈求亡灵免除地狱之苦的口头传承, 认为上古存在把观花作为祭礼的时代。^②

而日本学者折口信夫则认为, 奈良朝的和歌之中, 未见有赏樱花描述。上古的日本栽植樱花不是用来观赏, 而是用之于实用性的占卜活动, 樱花的开放凋落, 可以预兆稻谷丰歉。^③ 换句话说, 樱花与稻作祭礼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神话故事, 还是从民俗学的视点出发, 樱花无疑都与日本人的土俗信仰相连。由以樱花祈祷丰饶的稻作祭仪, 后来产生了镇花祭、安乐祭等习俗, 即在樱花落花的 3 月末 4 月初为除祛病疫举行祭祀活动。这在平安朝的宫中、神社非常盛行。

可以说, 与樱花相关的民俗信仰, 正是樱花这一文化符号所蕴涵的日本民族性所在, 构成了这一意义体系的母体。它表明, 在宫廷贵族醉心赏花的王朝时代以前, 在远离社会中心的另一端——一般民众层面已经有了对樱花的“反应”, 它赋予樱花“圣”的性格与意义, 为樱花文化历史的演进打下了基础。

其次, 世俗的赏花活动使樱花这一文化符号无止境地复制、传布开来, 为樱花广为大众接受提供了条件。正如民俗学家所考证的那样, 樱花最初与农耕之神关联, 并被作为占卜丰歉的具象之物; 或者附体于土俗信仰的守护之神, 为民众所膜拜。但是, 樱花这一文化符号并未完全

① 和歌森太郎「花と日本人」、『和歌森太郎著作集』第 8 卷、弘文堂、1981 年、135 頁。

② 柳田国男「信濃桜の話」、『現代日本文学全集 12 柳田国男集』、筑摩書房、1955 年、48—54 頁。

③ 折口信夫「花の話」、『折口信夫全集 2 〈古代研究—民俗篇 1〉』、中央公論社、1965 年、473 頁。

渗透进一般世俗生活。经过始自王朝时代的宫中、贵族知识层的花宴（赏花与酒宴结合），到中世的武士阶层，近世扩展到大众的赏花观樱；从和歌、俳谐、小说里的文学表现，到绘画、纹饰再到社会生活，樱花渐次浸透于日本社会的每一角落。樱花被赋予了“俗”的性格，以至于说到“花”，一般指樱花，即花=樱花等式成立，花成为樱花之借喻（metonymy）。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人自我认同过程中，与“他者”差异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心理，成了樱花内涵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它赋予樱花“民族性”的意义，直至近代被推至“帝国之花”的位置。

日本最早的和歌大成《万叶集》（8世纪中期）中有大量关于植物花草的诗句，其中咏梅诗达118首，远超过樱花的40首。另外，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8世纪初）中，咏花诗绝大部分是写梅花的，写樱花的仅有两首。梅花源自中国，在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向中国一边倒的律令时代，连审美、赏花的趣味也模仿中国，从宫廷到律令官人都醉心梅花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到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初），咏诵樱花的和歌数量则压倒性地超过了梅花，以后“花”一词也多指樱花。^①据说，平安迁都后，在宫廷内苑的紫宸殿南庭东西两侧，即左近卫府与右近卫府旁，分别植有梅树和橘树，但到了9世纪中期，随着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左近卫府旁改植成了山樱，始有“左近之樱，右近之橘”的说法。^②

古代日本人的赏花对象由外来的梅花趣味转向本土自生的樱花，究竟有无民族认同的因素起作用，具体的言说证据无从可考，但在律令体制走向衰落、由天平文化时代向藤原时代过渡之际，正如以遣唐使废止、大和绘、假名文字、女性文学等代表的“国风文化”取代“唐风文化”的时代趋势所显示的那样，日本人已尝试由模仿中国文化到开始独自文化的探索与创造，并取得一定成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樱花作为“民族性”的符号登场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① 据本居宣长考证：“唯言花乃谓樱花，古今集之前未有闻也”。参见：「玉勝聞」、『日本思想大系 40 本居宣長』、岩波書店、1978 年、216 頁。

② 山田孝雄『桜史』、44—47 頁。

三 近代日本樱花的“言说”与“国花”的成立

日本的樱花文化包含两大传统：边缘与中心。从平安中后期开始，樱花从土俗边缘走入社会中心，除了宫廷的花宴，还有贵族、武士举行称之为“樱狩”的赏花或赏花加打猎等活动。到了江户时代，更是呈现出以“群集”、“饮食”、“群樱”的群体参与为特征的赏花活动，少数人的“风雅”化为大众生活文化的一部分。而支撑这种大众行动文化的，无疑是社会的集团心理结构。这种集团心理推动中心与边缘、上层与民众各自培育的两大传统合流，樱花也就自然成为全民之花。

随着明治近代国家创立，樱花被植入国家这一共同体，通过各种“言说”的演绎，樱花=国花于是呼之欲出。樱花被赋予民族、国民、武士道乃至国家等象征意义。

明治后期的诗人、评论家大町桂月在其文集中曾写道：“在日本，言山为富士山，曰花则乃樱花之谓也”，“日本国民一般爱樱，樱花实乃日本国民之花也”。至于原因，他解释、比较了樱花与日本国民具有的特质：“其色淡红无造作态，突然开放而后转瞬无所眷恋地凋零，群树齐生，满山皆花蔚为壮观。若论日本国民之特质，淡泊恬然，达观慷慨，不畏生死，非个人而倚整体抱团方显强大”，因而断言樱花是“日本国民之表象也”。^①

和辻哲郎认为，樱花“突然、匆匆地绚烂绽放”，且“不执拗地眷恋枝头，而是同时匆匆地、恬淡地凋落”的特点，用来象征季风气候风土里生长的日本人的气质“非常贴切”。^② 这里，和辻展开的虽然是日本风土文化论，但也反映了他的樱花观，即因为恬淡短暂、来去匆匆的气质，樱花象征着日本民族。

其实，早在江户中期，国学者本居宣长就曾经把“大和心”之美比

① 大町桂月『桂月文集』、時文叢書第5編、東京隆文館、1912年、389—390頁（日本国会電子図書館）。此处及本文以下原文引用均系笔者所译。

② 和辻哲郎『風土——人間学の考察』、岩波書店、1994年、164頁。

作朝日映照下的山樱花^①，本居的樱论影响射程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除台湾澎湖列岛，还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后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归还辽东半岛，但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付巨额的“赎辽费”予日。其时，日本一媒体人这样著文道：

“伐清大军大举进攻，席卷辽东之野，有人遂在半岛植樱树五株，谓名曰‘朝日樱’，想必是为了让异域芳香馥郁永久，万年之春常驻。岂料转瞬间满目江山复归他人之手，名与花皆落空跌入尘埃。然而，不必拘泥于今，花若遇春总会发，要使敷岛（日本国别称——笔者注）的大和心得以彰显，唯有等待春天的再临。此间的樱花将是未来之花，必将迎来东风，吐露芬芳。”^②

这里，日军侵略中国成功，在占领的土地上栽植樱花树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可以读出经过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强国的日本战胜中国后的狂气；其次，樱花被视作对侵占土地可以显示拥有“所有权”的象征物了，如同打败敌人，把己方的旗子插上敌人的阵地。在此意义上说，樱花已被人为地看做明治帝国的象征之一。

日本近代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篇首写道：“武士道与其所象征的樱花一样，为日本这片土地所固有的奇葩。”^③虽然在言武士道，却同时反映了他的“樱花观”，即樱花是武士道的象征，为日本所固有。新渡户认为武士道的源泉在于佛教以及儒教的精神，同时也可从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为中心的神道里探根索源。自然崇拜使得对国土之爱深入日本人的内心，祖先崇拜则支撑着对现世神天皇的忠诚。

因此，他总结武士道里根植了“忠君爱国”的精神。换言之，这种“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精神是武士道的内核，为日本固有的“大和魂”。而同为日本所“固有”的、千百年来为日本人所喜爱的樱花，

① 本居宣长曾作和歌“敷島のやまと心を人とはば、朝日ににほふ山桜花”（若问大和心，当比山樱映朝阳，美丽竞绽放）。敷岛：大和国、日本别称，此处“敷島の”为枕词，起修饰作用无实际含义。此和歌本为本居宣长所作。参见本居宣长纪念馆网页：<http://www.norinagakenkan.com/norinaga/kaisetsu/tettei.html>。

② 村井弦斎『朝日桜』、東京春陽堂、1895年、巻頭（日本国会電子図書館）。

③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页。

被视作武士道的象征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因为新渡户终究没有展开为何将武士道和樱花相提并论的理由，此篇首唐突一句的个中原因，不排除受时流影响所为。

除了国学者、思想家等知识人言说的力量，明治政府也利用教育等公器有意识地推动樱花的国花化进程。从 1881 年 11 月至 1884 年 3 月，文部省音乐调查部门编写的《小学唱歌集》共 91 首歌曲中，除了如《君之代》《招魂祭》等灌输国家主义、天皇尊崇思想的曲目之外，歌唱樱花的就达 28 首。随着教材的广泛印制传播及歌曲的传唱，樱花即为国花、象征日本国家的意识从儿童开始就根植于日本人的精神深处。

下面，来看看日俄战争后旋即发布的《军人精神教育》中一段：

“其实自古以来，有‘花魁数樱花，人杰数武士’之说。所谓武士，即尔等军人也。若把军人以花喻之，则樱花正合也……（中略）一朝遇无常之风，则旧枝花香不再。即纵使烂漫绽开至极，一发枪弹飞来，则当毫无眷顾，如一滴露珠消散于战场。其心其事，何等勇烈高尚哉！”

原知樱易逝，心思有明日；无常狂风雨，夜半谁可知。（亲鸾作——笔者注）

尔等之职业即战斗！为了君国，生命轻比鸿毛。任让无常风暴来之，忘却父母妻子，义无反顾，岂不当抱定如樱花般散落之决心与觉悟乎！”¹

人生不过樱花一瓣，生死忽然，人生最高荣誉不过做“人杰”武士，军人即为当代武士，因此不应惧死，当以生命效忠君国。这里，正是利用了樱花的凋零无常，作为军国主义宣传与对士兵进行精神洗脑的工具。

其实，“花数樱花，人数武士”原为日本传统剧——净琉璃、歌舞伎狂言《忠臣藏》中的一句台词，这一赞美“赤穗四十七武士”、以宣扬武士道为主题的故事，经过 200 年左右历史的反复演绎，到了明治时期已家喻户晓。

小川和佑指出，从樱花生命短暂，疾速凋落，人们看到了武士对死

¹ 『军人精神教育』、東京厚生堂出版、1907 年、85—87 頁（日本国会電子図書館）。

的无惧，武士与死常常表里一体，不可分割。像樱花凋谢那样死才是武士道的体现，这一社会思潮通过《忠臣藏》的不断上演而成立。这种从樱花思考生死观的社会思潮，后来径直成为日本式思想。¹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新设立了国民军，通过从精神上注入“武士—樱花”生死观，使军人被塑造成军国的武士，樱花成为军人的隐喻。战死军人被喻作散落的樱花，其死在战前已经预约。这种生死观在二战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为天皇（国家）去死”，生死的价值等同于轻轻的樱花花瓣。

四 “若樱”散华：军国法西斯体制下的樱花隐喻

进入上世纪 30 年代，以“五一五”事件发端，日本政党内阁制终结。接着，以“二二六”事件为背景，日本军部势力确立了对国家的绝对支配权。军部内部的派阀争斗休止，为“总体战”的实施及法西斯主义的强化创造了条件。除了政治、经济、社会生产方面，还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日本陷入了极端国家主义的旋涡，滑向不断挑起、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在此历史语境下，樱花被赋予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意义，或者说，作为“国花”的樱花，成了制造为国家和天皇不惜赴死的日本国民一体化印象的符号。

总体战政策的结果之一，使日本大批的知识精英被御用，成为鼓动、美化侵略战争，动员日本国民奔赴战场的吹鼓手。像武者小路实笃、川路柳虹、土井晚翠、高村光太郎等一批文坛的领军人物不遗余力地鼓吹“举国一致”、“一亿一心”，以诗歌等文学作品形式展开各自的“爱国”言说。

土井晚翠在《大敌迫近》（《公论》1944年 8 月号）一诗中写道：“富士之巅高入云 / 高不过大和魂 / 绽放吧 樱花万朵 / 力量凝聚吧 百炼破邪之剑 / 即使有形的一切 / 皆消亡 却有大和魂 / 与天地之凛然正

¹ 小川和祐 ã日本の桜、歴史の桜ã、日本放送協会、2000年、107 頁。

气/万古恒存 益发昌盛”。^①显然,土井所讴歌的大和魂,即像“万朵”樱花凋谢那样的、不畏死的精神。

文化知识人的关于樱花的“言说”,也体现在鼓动战争的军歌创作活动中,樱花在大量的战争动员歌曲里登场。大庭景阳作词的军歌《樱花》,以“忠义樱”一语,赞美“大和男子”的忠烈,歌颂“天皇的威德必将广耀世界,与樱花一道迎来千秋万春”。一首由文部省作词作曲、编进学校音乐教材里在国民学校音乐课广泛教唱的名为《特别攻击队》的歌曲,有这样一段歌词:“啊!大东亚圣战/我们誓言为天皇赴死/先驱者散落/如同若樱飘零”。^②众所周知,特别攻击队即特攻队,是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挽回颓势,陆海军特别是海军航空兵采取的自杀性攻击的“人机炸弹”,歌曲用“若樱”(日文“若桜”,意指树龄小的樱花树)设喻,把战死的年轻士兵比作凋落的樱花,即樱花为战死者的隐喻。正是“若樱”这一巧妙的装置,驱使无数年轻生命为天皇专制的法西斯国家赴死,同时,非但没有恐惧与残忍,反给这种死添上“美”的色彩与浪漫。

在鼓动战争的宣传里,有关樱花最多的表述恐怕就是“散华”(日文表记作“散華”(sange))。散华原本为佛教用语,意为:(1)做佛事时在佛面前散布花;(2)四(密教为两个)法要之一,法会时在花筐里装入五色莲花状纸花,一边唱佛教颂歌一边散撒;(3)法会上散华时歌唱的一种颂歌。^③因为日语中“散”表花谢之意,“华”也指花,故“散华”被解读为“花凋谢”,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成为“战死”的隐喻,经过反复鼓吹,乃至变成了给战死赋予一种神圣的、宗教色彩的、富于荣誉的“美称”。对受军国主义彻底洗脑者来说,无疑会从“散华”中看到“美感”与“责任感”。^④“樱花散落”成了歌颂宣传军国主义的一大主题。

① 小山敦彦『復録日本大雑誌昭和戦中篇』、流動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428—429頁。

② 山中恒『ボクラ小国民と戦争応援歌』、1985年、103頁。

③ 参见《广辞苑》第五版关于词条“散华”的释义。

④ 儿岛襄在题为《海军散华的美感与责任感令人感动》的序文中说:“‘散华’这一词汇飘散着一种微妙的美感,‘散华’用来形容远离私利的战死,看起来也许非常适合。”参见:春山和典『海軍・散華の美学』、株式会社ベン社、1973年、1—2頁。

1943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战死，《音乐之友》（1943年7月号）发表了胜承夫作词的《啊，山本五十六元帅》这首歌曲，歌颂“军神”山本之死像樱花般“散落天空”。同杂志还刊载佐藤春夫作词的作品《魂已高翔》，赞颂如樱花散落般死的“大丈夫”气概，祈祷“军神”转生为“故乡的樱花”，魂照靖国。¹ 樱花不仅是战死的象征，而且还被赋予战死者的转世物的象征意义。

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有一首被广为传唱的名为《同期的樱花》的军歌。歌词这样写道：“既同为樱花 / 当报定必死之决心 / 为了国家让我们美丽地凋落……我们将再会 / 在花都靖国神社 / 在春天的枝头绽开”。² 歌中的樱花，既是年轻的学徒兵，也是战死者来生转世的归处。很多日本“军国少年”、青年人就这样很“自然”地、毫无抵触、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军国主义的宣传，在“相约靖国神社的樱花树下”的口号鼓动下，为国家、为天皇而赴死。

1945年2月开始，有一首通过广播进行国民合唱的指导歌唱曲目流传，即西条八十作词的《菲律宾决战之歌》。³ 这里节录一段：“辉煌的决战 亚细亚的曙光 / 舍生忘死的若樱 / 在菲律宾岛 竞相绽放 / 来吧！尼米兹 / 来吧！麦克阿瑟 / 只要出现 必将你打回地狱”。对此，山中恒氏借用清泽冽《黯黑日记》中的话说：“已无法忍受让人唱这种毫无价值的歌曲，这是让年轻人去送死，”歌词“毫无诗情，整个是一首鼓动赌棍、暴徒上阵的歌曲”。

事实上，彼时以日本“武藏”、“大和”等巨型战舰毁灭为标志的菲律宾岛决战，使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彻底覆亡，给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制海权画上了句号。那些无数如若樱般“散华”的战死者亡灵，叙述着军国法西斯日本从顶点的坠落。

¹ 山中恒，前引书，第190—194页。

² 『軍歌と日本人』、宝島社、2007年。

³ 同¹，第161页。

五 扩展文化符号樱花的“言说”空间

日本樱花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即使在相同时态下，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表象及解读。特别是在近代，关于樱花的社会言说空间无限扩大，无法对所有话语一一进行分析，使人们对樱花这一文化符号难以作出全面的诠释和把握。本文仅就被政治意识形态，即日本近代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所操弄下、人为制造的“国花”进行解读，尝试一窥它所隐喻的内容。

近代，日本建立了天皇制近代国家，实现“脱亚入欧”，跨入列强行列，随后明治帝国走上侵略亚洲之路。樱花的国花之路与其相随并行。从古代农耕祭仪、土俗信仰的寄托之物，到和歌咏叹、绘画的表现对象；从宫廷贵族的赏美，到近世庶民的“花见”；从“大和心”的表象到武士道和日本国民、国家的象征；从为国家（天皇）战死的“若樱”、“散华”，到靖国神社内象征战死者转世的“同期之樱”……在樱花符号化的过程中，其象征意义不断演变，新旧相承。在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推动下，完成了“帝国隐喻”的构建。

具体说，是极端意识形态借助各种媒介的共同作用，使樱花成了“大日本帝国”、“不惜死的帝国军人”、“为国家而死的士兵转世物”等的象征。特别是社会的主流“言说”影响颇巨，本文前面列举的军歌即为一例。

此外，除了社会现实的语境，历史、传统的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樱花文化符号内涵变迁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部分，比如与日本人生死观、与武士道等的关系，也是现实能够利用樱花的文化符号意义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前提。前文对近代以前樱花文化的概述，即是为了说明“帝国隐喻”构建的历史前提，因为它是樱花这一符号体系的基层。

当然，如前所述，仅从某个或少数几个切口来分析樱花的内涵体系是不够的。作为“国花”，它装饰了日本军国主义非理性的狂热，也随着帝国的覆亡而凋落。战后，军国主义的体制及土壤被铲除，战败规定了日本历史新的转换，樱花作为“帝国”的隐喻自然不复存在。

但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樱花，正如其内涵在历史上呈现出多重性一

样，现代日本也同样如此。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樱花的隐喻有了新的元素，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其表现为：一是战后文学中，以梶井基次郎、坂口安吾、石川淳等为代表¹，其关于樱花的言说从根本上颠覆了“帝国之花”的象征意义；二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问题，在回归、保护自然，寻回“美丽日本”的社会思潮与行动下，重新启动了全国各地赏花名胜地，樱花原本的美得以重新确认、普及；三是以生活中常常遭逢的日用品的樱花创意、每年春季媒体沸腾的樱花情报、赏花活动等为表征，可以说今天的樱花尚盛开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据三得利“次世代研究所”2001 年关于“现代家庭年中活动”的调查报告，57.2% 的家庭有赏樱花活动²，因为调查对象限定了家庭，而实际上社会上以公司、亲友、学校等为单位进行的赏花活动也很多，这也反映了日本社会长期固有的集团主义、群体意识基础依然没有改变。

此外，与战后日本右翼保守思想持续存在相随，企图复活战前樱花种种象征意义的话语依然存在，但毕竟不是主流，现代的樱花更多的是渗透进日本人生活文化中、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与人们精神消费相关的元素。今后国花与国家的研究仍然留有许多课题，比如关于樱花的言说研究空间也有待扩大，须从更广、更全面的视野，进行更集中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 林昶)

¹ 梶井基次郎在小说《樱花树下》开篇写道“樱花树下掩埋着尸体！”，文中表达出从盛开的樱花看到死，生的顶点即为死的到来的生死观与樱花观；坂口安吾的《盛开的樱花林下》描述的樱花树下鬼灵出没，似乎回复到了古代土俗信仰；石川则在《阿修罗》中也展开了关于“樱鬼”的故事。

² <http://www.sunbry.co.jp/culture-sports/jisedai/active/event/apr.html>